·论 坛·

非洲基督教会政治立场转变原因分析

郭 佳

内容提要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非洲基督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出于生存的考虑，教会采取与政府“妥协”甚或“合作”的态度；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非洲基督教会在政治上逐渐趋于活跃，并在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内部因素，诸如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状况恶化、政教关系发生变化、教会自身实力增强外，同时也受到国际政治气候和国际教会组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关 键 词 非洲政治 基督教会 政治民主化

作者简介 郭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在挣脱了殖民枷锁的束缚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政治体制转型：第一次发生在独立初期，由多党民主政体向集权政体（一党制和军政权）转变；第二次发生在冷战终结之际，在内部求变、外部高压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政治民主化浪潮迅速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并直接导致了非洲国家集权政体的瓦解，以及以多党制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建立。① 在第一次政治转型中，基督教会的作用是模糊的，仅仅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②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集权政体的高压态势下，教会甚至还一度采取了与

① 参见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宏明著：《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78页；Terence O. Ranger, *Evangelical Chri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9.

② See Terence O. Ranger, op. cit., 2008, p. 9.

国家“合作”的态度。然而，进入80年代后，教会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教会的作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非洲国家集权政体的政治取向，但至少对政府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在冷战终结之际勃兴的民主化浪潮中，教会更是扮演了开启者、组织者、调解者，乃至监督者、教育者的角色；并在调解矛盾、化解危机、监督政治转型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小视的作用。例如，在民主化浪潮初兴之时，很多国家的教会领袖成为这一进程的鼓动者、策划者和组织者；当非洲国家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之后，一些国家的教会势力扮演了民族和解与民主复兴的调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在进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过程中，教会又担当起了监督员的角色，等等。① 惟其如是，英国学者保罗·吉福德在《基督教会与非洲民主化进程》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在冷战结束之时，非洲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人民试图推翻压迫他们、使他们陷于贫困的政治体制。虽然非洲各国的斗争并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教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基督教会政治态度和政治角色的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教会势力的消长，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教会组织的影响等因素紧密相关的。

非洲形势与政教关系

20世纪60~8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国家中，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大致经历了抗争、归顺、“合作”、批判或抨击等几个阶段。导致教会与国家关系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并且主要是内部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恶化。教会从来就不是一个中立组织，其关注点从来也不局限于精神领域，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非洲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国家对教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会在政治上的立场。

---

① 有关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郭佳：《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探析》，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3期，第27~32页。

② Gifford Paul e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frica*, Leiden: E. J. Brill, 1995, p. 1.

（一）独立初期非洲基督教会与国家的力量对比及政教关系

独立初期，非洲大陆虽然仍旧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但多数国家的经济仍有缓慢增长。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非洲经济形势的总体状况还比较好，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肯尼亚、喀麦隆、赞比亚等，通过制定、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一度初见成效，甚至获得了经济上的较快发展。当权者的政治权威亦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非洲天主教会和新教主流教会为代表的教会势力却因殖民政权瓦解而处于衰退状态。教会领袖也意识到面对国家，自身所处的弱势或不利地位：如果是白种人，他们的政治参与很有可能被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黑人牧师、主教的处境更为尴尬，他们的举动很容易被视为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教会自知无力与国家进行正面的抗衡；而非洲国家的当权者亦认为教会不会对国家构成大的威胁。因此，在独立初期，当非洲国家政府出于维持公共事业、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对教会采取“怀柔”政策的时候，教会便顺势“欣然”接受。虽然对一些社会问题颇有微词，但是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环境，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了保持沉默的选择；即使对某些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也只是含蓄地、有针对性地就事论事，不会触及问题的根基。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国有化”或“非洲化”运动时，在国家严厉的打压和控制下，一些国家的教会索性归顺于当权者，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教会尚能与国家“相安无事”，但在这种表象的下面仍然有暗流涌动。事实上，教会对政府的独裁专制以及滥用权力等问题始终心怀不满；只是鉴于当时非洲整体经济状况较为稳定，加之自身实力尚弱，出于生存发展的策略考虑，表现出与国家“合作”姿态；但教会“坚持对某些价值观，特别是对民主价值观尊重”① 的立场却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二）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经济政治形势恶化与教会政治态度的变化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国家发展政策的失误，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非洲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了困境，一些宏观经济指

① See Richard Joseph,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John Witte ed.,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1993, p. 234.

标，如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收入都呈下降趋势，整个80年代在非洲国家发展史上被称为“失去的十年”。[①] 随着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威权主义、贪污腐败、部族政治却在不断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特别是到80年代末期，非洲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并发的恶性循环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会对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教会不再对威权政府保持沉默，并逐步在政治上趋于活跃。这在喀麦隆、布基纳法索、肯尼亚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教会对国家的抗争亦随之由过去仅对某一特定事件或某一方面的不满，转变为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作为对教区居民物质及精神生活关注的一部分。原因还在于，经济危机、政治专制也影响到了教会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教会对集权国家将其他机构的职责都独揽于手的措辞严厉的谴责中得到印证。这也促使教会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转化到“捍卫政治自由和反抗独裁统治的更广泛的层面上来”，[②] 并最终直言不讳地向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

通过对20世纪60～80年代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梳理可以看出，教会对国家的“归顺”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服从，而是在经济状况、政治治理、社会风气尚可以忍受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以保证其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为底线的有条件的服从。另则，从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而言，虽然在国有化或“非洲化”运动中，曾对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布）、布基纳法索等国的教会进行过打压；但是在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政府给予教会的自由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事实上，教会与政府互有所需并且彼此之间似乎也达成了一种默契：非洲国家政权有时需要教会来“装潢门面”，补充其公共职能；教会也需要国家为其生存提供一定的空间。因而，即使教会对威权政府有所怨言，也不愿轻易地破坏这种默契。只要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还在能够容忍范围之内，教会只会“部分地、有针对性地”

---

①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表明，1991年与1980年相比，非洲经济状况总体上恶化了40%，此外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非洲也落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尼日利亚，当巴班吉达总统在1993年离任时，该国的人均收入仅为其8年前开始执政时的1/10；喀麦隆的人均收入在1985～1993年之间下降了一半。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及数据还可参见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前引书，第48～51页。

② See Richard Joseph, op. cit., p. 235.

批判，而不愿意或更确切地说，不敢进行公开而全面的对抗。[①] 喀麦隆教会政治立场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阿希乔统治时期（1960～1982 年）喀麦隆的政治氛围并不自由，但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因此教会与国家关系还算和谐；但到了保罗·比亚时期（1982 年始），正是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全面危机最终促使教会将矛头指向当时的政治体制，提出民主变革的主张。与喀麦隆相似，在贝宁、刚果（布）、肯尼亚、扎伊尔、多哥、赞比亚等国，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成为教会政治立场转变的催化剂。

由此可见，教会对威权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只是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二者之间潜在的矛盾才凸显出来。导致教会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非洲经济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教会政治态度转变的时机把握可谓正当其时，教会自认为在这个时期可以作为社会的代言人。

基督教会自身实力增强

教会是非洲集权国家（包括一党制和军政权国家）内除执政党或统治集团以外组织机构最为完善的社会团体，加之，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在民众中，特别是教民中拥有集权政府（一党制和军政权）所不具有的威望。从独立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基督教会已发展成为非洲最强大的市民社会组织，教会实力的上升使其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成为可能。

（一）教会在公共领域发挥着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洲国家独立不久，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向集权政体。当反对党被取缔、新闻自由被剥夺、制衡机构形同虚设时，通常只有教会拥有一些有限的自主权。按照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拜亚的说法，教会成为非洲政治体系中的一片“自由地带”，是极少数被允许建制存在的社会组织之一。[②] 此外，非洲教会还从国外的教会组织获得大量的发展援助，因此，基督教会是非洲各国除执政党或统治集团以外组织机构最完善的社会团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会在公共部门、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或缺失。

---

① Richard Joseph, op. cit., p. 234.

② Ibid., pp. 232－234.

例如成立于1946年的刚果（金）浸礼教会，是“刚果新教理事会”的成员，也是“刚果基督教协会”的创始者。它由不同的部门组成，诸如福音传教部、教会生活和使命部、教育部、医疗与服务部、妇女与发展部等；除了福音传教以外，还致力于公共领域的建设。在医疗卫生领域，它拥有9家医院、90多个保健中心和2所护士培训学校，担负着治病救人与培训医务人员等重要的责任。

在马拉维，南部有姆兰杰（Mulanje）教会医院，其前身是始建于1896年，隶属于“中部非洲长老教会”（The Church of Central Africa Presbyterian, CCAP）的布兰太尔教会医院。医院创建初期以妇产科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增加了儿科等科室，同时，通过众多医疗保健站，为周边70多个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医院也提供孤儿护理培训，特别关注营养不良的儿童，通过治疗使他们得以康复。在中部地区，则有1889年由传教士创立、隶属于“中部非洲长老教会”的恩科奥玛（Nkhoma）教区医疗卫生机构。至80年代，该机构已经发展成为马拉维中部地区医疗服务的中心。

由肯尼亚最大的新教教派于1916年创立的吉扎贝（Kijabe）医院，至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同时深受民众信任的一家医院，不仅肯尼亚人来此看病，甚至周边国家，如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的病人也慕名而来。此外，成立于1908年，隶属于“东非长老教会”的肯尼亚吉库尤医院同样具有很高的声望。

在南非，随着法国、比利时、德国、爱尔兰传教士深入内陆传教，教会学校、医院亦逐渐增多；至20世纪中叶，天主教创办的41家医院和29个诊所已经遍及全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医疗网。某种程度上说，天主教医院是南非第一批医疗保健机构。80年代，在修女希拉（Sister Shelagh Mary Waspe）的倡议下，天主教医院的联合会“天主教医疗保健协会”成立，之后，“天主教护士协会”、“天主教医生协会”等也纷纷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南非教会医院的发展。新教循道宗教会也同样在南非成立了一批诊所和医院，并设立了护士、实习助产士以及社区医疗保健人员的培训项目。

此外，在布隆迪，教会建立的医疗和社会救济机构，接诊人数占小诊所的1/3、医院的1/2。在利比里亚，则有新教教会于1965年创办的著名的埃勒瓦（ELWA）医院，及天主教会在蒙罗维亚创建的圣约瑟天主教医院。

教会除了在非洲的医疗卫生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外，在促进非

洲教育发展方面同样也是功不可没。非洲现代教育肇始于殖民时期的教会学校，基督教会在非洲现代教育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即便在非洲国家独立后，教会学校依然是培养人才的重镇，占到学校总数的60% ~75%，[①] 在非洲教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布隆迪，天主教会掌控着2/3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实现了接近22%的学龄儿童入学率；[②] 刚果（金）浸礼会与政府协作，保证了600多所小学和400多所中学的正常运转，它还同其他基督教会，特别是同为“刚果基督教协会”成员的教会一起，积极推动一些文化机构，如刚果新教大学、基督教福音派文学中心的发展建设。此外，教会还筹划建立了一批质量很高的大学，例如利比里亚的唐·博斯科理工大学、乌干达的东非基督教大学、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洛瓦宁大学和伊利沙伯维尔大学等。非洲的很多领导人及政府官员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或者是从教会那里获得了最初的思想启蒙，他们也因此与教会有着深厚的感情。例如，喀麦隆阿希乔时期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的蒙布姆（Eteki Mboumoua）；先后担任财政部长的科瓦耶（Enoch Kwayeb）与库拉（Kula）；安全部门负责人蓬帝（Pondi）；保罗·比亚时期的参谋长塞芒戈（Sémengué）将军等，都与教会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③] 由于得到了一些有名望的人和权威人士的尊重或庇护，教会的处境亦因此得到改善。

教会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福音传道的范畴。[④] 除了医疗卫生和教育之外，教会的影响还伸展到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例如在卢旺达，教会通过为民众提供文娱场所、消费品、引进新的农业作物和农场技术、发放农产品种子、创办有经济利益的项目等工作，赢得了社会声望。

---

① Donald George Morrison, Robert Cameron Mitchell and John Naber Paden, *Black Africa*,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p. 30.

② Cf François Constantin et Christian Coulon, *Religion et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n Afrique*, Paris: Edition Karthala, 1997, p. 338.

③ Cf François Constantin et Christian Coulon, *Religion et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n Afrique*, Paris: Edition Karthala, 1997, pp. 200 - 201.

④ Linden, Ian, and Jane Linden, *Church and Revolution in Rwanda*,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pp. 33 - 114; Kalibwami, Justin 1991 *Le catholicisme et la société rwandaise* 1900 - 1962, Paris and Dakar: Karthala, pp. 171 - 195; Twagirayesu, Michel, and Jan van Butselaar eds, *Ce don que nous avons reçu: Histoire de l' Eglise Presbytérienne au Rwanda* (1907 - 1982), Kigali: Eglise Presbytérienne au Rwanda, 1985, pp. 15 - 67, See Timothy Longman, "Church Politics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XXXI,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1, p. 170.

教会还拥有一些极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以及大量的可资利用的教堂、报纸、杂志、电台等社会资源。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东非文学社及刚果新教联合会和传教机构就共同创立了刚果福音文献社，出版圣经译本和各种书籍、报刊。[①] 再如，在布隆迪，教会主办的周刊《恩东科奇》（Ndongozi）培养了大批的社会精英；1911年，由天主教会创刊的《卢干达语日报》是乌干达历史最悠久的报纸；1942年，由刚果（布）天主教会创办的《非洲周刊》，不定期出版，是该国最主要的出版物之一。此外，利比里亚教会拥有著名的埃勒瓦（ELWA）电台，自1954年运营以来发展迅速，用45种语言向利比里亚及其邻国播放广播节目。教会设立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福音之声电台同样影响广泛。

总之，教会在社会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新闻媒体方面的运作，使其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获得提升。

（二）教会享有集权政府难以比拟的社会威望

教会不仅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具有威权政府难以比拟的社会威望。独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非洲国家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公立学校、医院、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因而逐渐失去了民心。相比于政府，教会可以用较少的资源获得更多持续的成果，不仅赢得了社会赞誉和威望，而且还使政府试图为失败的国家治理开脱的各种借口难以立足，进而使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不断削弱。[②] 另则，教会自身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组织，在教会的下属机构中建有青年团体、学生社团、贸易联合会、妇女组织和发展事务处等组织。此外，教会自身的社会威望，以及对政治所持的开明、包容态度，还使之成为了其他市民社会的避难所。市民社会组织越是受到独裁政权的打压、吞并或肢解，它们就越是被基督教会所吸引过去。[③]

市民社会是一个成熟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并在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对国家形成重要的补充。同时，市民社会对国家所持的批评性态度，也使其成为政治治理或政治变革的力量来源。在非洲，鉴于市民社会发育先天不足，几乎没有出现能发挥平衡政府作用的社会组织，国家实际上就等同于当权者。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多数时间

---

① 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② See Richard Joseph, op. cit., p. 235.

③ Ibid., p. 236.

里，教会是唯一得以在威权主义压制之下获得一定程度发展的社会组织。在“无为”或是与独裁政府“合作”的表象下，教会暗中却在通过吸收信徒、招募教士、扩大组织规模等方式不断积蓄力量。进入20世纪80年代，教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非洲最强大的市民社会组织，并且拥有集权政府难以企及的社会威望。因此，有国外非洲问题学者甚至认为，“教会才是国家之内真正的国家”，[①] 只有基督教会“有能力超越部族界限、阶级划分、种族集团、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边界同人民对话”，[②] 在非洲社会没有另外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能与之相媲美。这使得教会在对政府的某些公共职能进行必要补充的同时，也成为了政府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许多非洲国家中唯一可以与政府相抗衡的力量。此外，从基督教会本身的属性来看，宗教从来不曾脱离政治领域，二者是一对相互结合又相对独立的矛盾体。当世俗政权处于强势时，宗教势力一般利用其掌握的精神、道德资源对世俗权力施加影响；反之，当宗教势力处于强势时，它不仅运用精神力量，而且会动用其实体性的社会力量，担当起市民社会的职责，发挥着“被禁止的反对党的作用”。[③] 在冷战终结之际勃兴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非洲基督教会扮演的正是这一角色。

西方基督教会的影响

虽然非洲国家的基督教会大都经历了“非洲化”过程；然而就整体而言，作为基督教世界中的一部分，它们与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基督教重心的南移，[④] 国际教会组织加大了对非洲大陆的关注力度，非洲教会对国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基督教势力的影响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这可以从罗马教廷与“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所作所为中得到印证。

---

① Richard Joseph, op. cit., p. 236.

② Ibid., p. 238.

③ 参见孙雄：《圣俗之间——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9页。

④ 自20世纪以来，西方信仰基督教的人数逐年减少，而与此同时，南半球信教人数猛增，非洲是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基督徒人数于1960年超过该地区的穆斯林人数，1965年时已达到非洲总人口的25%，并且仍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长，新受洗入教者平均每年多达150万人。参见卓新平著：《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8页。

（一）罗马教廷对非洲天主教会的影响

罗马教廷是天主教会的中央行政机构，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罗马教廷贯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下称“梵二”会议）的精神，致力于推动世界天主教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加强同全世界的对话。非洲教会作为其中的成员，在神学思想、组织结构等各方面进行了革新，使教义及教会活动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且开始思考教会在社会变革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1. 罗马教廷的神学革新对非洲教会的影响

“梵二”会议后，罗马教廷在神学思想方面改变了过去对尘世的忽视，开始重视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结合社会现实问题对神学进行“时代化”和“本土化”解释，寻求一种与社会有着贴切关系的政治神学。其要旨是号召教会更多地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承担责任，这就为天主教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非洲，教廷在神学理论方面的革新促使非洲天主教会立足于本国、本民族和本地文化，反省自身问题，构建出非洲模式的处境化神学。[①] 非洲处境化神学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教会在社会层面的使命与责任，指出多数非洲人正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这种环境是罪恶的，不可忍受的，教会人士及其信徒的使命便是改造这种社会。[②] 需要指出的是，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一直没有相应的神学理论来定位教会与新生非洲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非洲处境神学的出现为非洲天主教会思考当前的社会问题和自身应担负的使命指明了方向。

2. 罗马教廷的组织改革对非洲教会的影响

长期以来，天主教实行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的教阶制度，罗马教廷将教会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梵二”会议后，教廷进行了组织改革，强调团体的作用，注重发挥一般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作用，以分权给地方教会和地方主教。

教廷对平信徒团体的重视与扶植，推动了非洲“基督教基层社团”和

---

① 所谓“处境”大体可涵盖世人的“生命体验”、“历史处境”、“社会场景”、“文化背景”、“经济环境”和“政治情景”等。从这种处境中形成、并回应这一处境中问题及挑战的神学理论，则被称为“处境化神学”。参见卓新平：《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② 雷雨田：《论基督教的非洲化》，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56页。

“基督教家庭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得到了教皇保罗六世的认可之后，更是发展迅速。这些社团恰好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教会为应对与政府关系的危机需要对自身组织进行重构之时，它们在地方民主化以及国家公共职能所忽视的领域发挥作用，补充了教会职能，完善了教会的组织结构，提升了教会的社会威望，形成了教会成员间的内聚力，增强了教会与国家抗衡的能力。

本着分权给地方教会和地方主教的精神，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与保罗六世都注重进一步扩大红衣主教团的代表性，尤其注意吸收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教，教皇通谕以及一系列会议文件开始肯定培养非洲本地主教的必要性。20 世纪 60 年代初，整个非洲只有 27 名主教，而至 70 年代初，非洲已经拥有 118 名主教，[①] 80 年代以来，非洲 70% 以上主教辖区在本地教团的领导之下。1984 年，非洲红衣主教甘丁当选为梵蒂冈司法治安委员会主席和圣主教会议负责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首次被聘任为如此显赫的圣职。[②] 非洲主教在国际教会组织中占据一席之地和非洲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本土化增强了非洲教会的实力，使它们可以自由选择适合本国、本民族教会的发展道路，在面对政府的滥用职权等问题时也不会再像以往外国传教士那样谨言慎行，这些都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促使教会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潜在推动力。

3. *罗马教廷的“对话行动”对非洲教会的影响*

“梵二”会议后，罗马天主教会抛弃了一直以来保守、封闭的立场，加强了与全世界的对话。与世界的对话使教皇更加注重自己的主教身份，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来；他们不仅仅关心传教布道，也关注国家发展、难民、人权、裁军等其他问题，并适时、适度地表达对战争、剥削压迫、非正义等问题的谴责。

从教皇走出梵蒂冈公开投入国际政治活动开始，历代教皇都十分重视非洲。教皇保罗六世在位时曾 4 次访问非洲，他的继任者保罗二世更是加大了对非洲的关注。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教皇保罗二世先后 9 次出访非洲，其密度之高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提高了非洲各国教会的社会政治地位。特别是在民主化进程蓬勃发展的 1989 ~ 1992 年期间，教皇 5 次访问非洲，足

① 张宏明著：前引书，第 196 页。

② 雷雨田：前引文，第 54 ~ 55 页。

迹遍及20个非洲国家。[①] 教皇选择这个时机访问非洲绝非巧合，因为其在非洲访问时除了开展扩大基督教影响的宗教活动外，还发表了对非洲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看法，并明确表示支持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教皇保罗二世在《非洲教会及其至2000年的福音布道》的长篇通谕中指出，由于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不同地区的问题是相互影响的。东欧的“变革之风”已经影响到非洲的各个角落，非洲大陆人民对自由、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罗马教廷很高兴看到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已起步，朝着建设法制国家的方向努力，并且对非洲教会忠于职守并按照其使命坚定地站在被压迫者和人民一边表示满意。[②] 1994年4月10日~5月8日在梵蒂冈召开的非洲主教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教会在非洲政治变革中应扮演的角色。会议指出，以尊重多元化为特征的真正民主是非洲国家实现政治公正的出路，教会亦将和人民一道沿着这条路前进；根据《圣经》的精神，教会有责任和义务号召、组织基督教徒投身到民主化进程中与暴力作斗争，这亦是教会参与非洲大陆的民主与法制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③] 由此可见，非洲基督教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态度的转变与罗马教廷的支持和鼓励密不可分。

（二）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对非洲教会的影响

“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下称“世基联”），是以新教为主的普世教会运动[④]发展的产物，于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成为普世教会运动的核心机构。“世基联”和许多新教宗派的世界性组织、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教会联合会以及东正教、天主教会都建立了发展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逐渐由新教范围扩展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国际教会组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亚非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世基联”就对亚非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意欲探讨教会对亚非地区“社会迅速变化”可能承担的“责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世基联”广泛吸收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加盟，联合会内部不仅第三世界国家教会会员数量迅速增加，其教会领袖地位也逐步提

---

① 张宏明著：前引书，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267~268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

④ 普世教会运动是以新教为主的现代基督教界所倡导的各宗派联合为一体的运动，是当代基督教的发展趋势之一。

高。“世基联”认为教会具有社会方面的意义，应当将其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领域而非仅限于精神领域，并以支持南非黑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实际行动，呼吁第三世界国家教会关注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社会不公、专制独裁等社会政治问题，鼓励它们投身于反对威权主义的政治斗争。这一点在非洲基督教界，特别是新教主流教派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新教的神职人员“使用圣经作为他们公开陈述的思想理论来源，表达对独立、公平和自由的诉求”。①

此外，“世基联”推动了非洲教会合一运动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加纳和肯尼亚等14个国家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63年，“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立，成为整个非洲新教的联络中心；70年代又成立了“非洲基督教神学家普世协进会”。非洲教会合一运动的发展促使新教教会之间共享更多的资源，活动内容有所扩大，很多文化机构得以建立。例如“信义宗世界联盟”投资200万美元建立了亚的斯亚贝巴的福音之声电台，工作人员达300人，使用多种语言播音，全非及中东民众均可收听。② 随着实力的上升，教会在政治上的要求必然有所增加，这也是非洲教会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国际教会组织不仅为非洲教会在现实世界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了理论来源，也通过组织改革和物质支持增强了教会实力，提升了它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对于非洲基督教会政治立场的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　语

综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普遍的经济、政治衰败挑战着教会对集权政体容忍的底线；而此时政府希望与教会合作来扭转低迷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心理，亦为教会参与政治创造了条件；加之教会势力力量的增长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教会逐渐从幕后走向政治前台。笔者认为，有4个主要因素决定着非洲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及其政治态度：其一是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其二为教会的生存环境；其三是教会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实力；其四是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宗教组织的支持。非洲的经济政治状况越趋恶化，教

① See Terence O. Ranger, op. cit., p. 10.

② 于可主编：前引书，第260页。

会的生存环境越宽松，教会自身的实力越强大，则参政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表现出更多的漠然性与妥协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教会的生存环境尤为严酷，同时，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非洲教会面临身份认同的缺失和自身实力的衰落，所以这一时期教会表现出更多的是对当权者的迎合、妥协与归顺。而进入 80 年代，非洲各国与教会自身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各个因素都朝着促动教会政治立场转变的方向发展，加之外部因素的催化效应，教会政治立场的转变势在必行。由此可见，虽然非洲国家众多，情况各有不同，但总体上说，非洲基督教会政治立场的转变是多种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关键，外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African Christian Church's Political Position

Guo Jia

Abstract: By the end of 1970s, the role of the African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had been insignificant.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existence, the Church made a compromise to the authority, or cooperated with it. However, into the 1980s, the African Christian Church gradually became more and more active in politics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change.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nal reasons, such a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frican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stat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rength of African Christian church; the global political clim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hurch's organizations can be discerned as the external reasons.

Key Words: African politics; Christian Church; Democratization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